

现代新儒学的走向



XIANDAIXINRUXUE
DEZOUXIANG

宋志明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新儒学的走向



宋志明 ◎ 著

XIANDAIXINRUXUE
DEZOUXIANG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新儒学的走向 / 宋志明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303-09827-9

I. 现… II. 宋… III. 新儒学—研究 IV. B24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0956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55 mm × 235 mm

印张: 19.25

字数: 236 千字

印数: 1~2 000 册

版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策划编辑: 祁传华 责任编辑: 祁传华

美术编辑: 高霞 装帧设计: 彩奇风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内容介绍

本书不再以“述”为主，而是以“论”为主。力求在弄清楚每一位现代新儒家主要人物的思想状况的基础上，捕捉他们提出的具有普适性的问题意识，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形成超越现代新儒家的新结论。本书从现代性向度、全球化向度、本体论向度、价值论向度、民族精神向度对现代新儒家作整体的、综合的考察。现代新儒家已经成为历史，而现代新儒学仍然在发展。我们不必拘泥于现代新儒家的讲法，也不必以“现代新儒家”自诩，但应当大胆地探索现代新儒学，找到更新的讲法，从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照着讲”转向“接着讲”，是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是突出的特色。现代新儒学思潮虽然是现代新儒家提出的一个话题，但到 20 世纪末，已经不再局限在现代新儒家的范围内，已经变成全中华民族的思想动向，变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新儒学思潮 /1

- 一、现代新儒学思潮的起因 /2
- 二、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历程 /9
- 三、现代新儒学思潮的表现形态与走向 /27

第二章 现代性向度 /37

- 一、儒学与市场经济 /37
- 二、儒学与工具理性 /48
- 三、儒学与民主法制 /60

第三章 全球化向度 /76

- 一、儒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 /76
- 二、儒学与全球伦理 /89
- 三、儒学与后现代视角 /100

第四章 本体论向度 /103

- 一、生命本体论 /103
- 二、体用不二论 /109
- 三、“理世界”本体论 /118
- 四、“心理合一”本体论 /125
- 五、道德的形上学 /132

第五章 价值论向度 /144

- 一、内在的取向 /144
- 二、超越的境界 /155
- 三、新式的儒者 /169
- 四、内在与超越的统一 /180

第六章 民族精神向度 /186

- 一、民族精神的目标定位 /186

二、民族精神的培育理念 /197

三、儒学与精神文明建设 /215

附录 儒学源流 /232

一、引言 /232

二、儒学的源头：先秦儒学 /234

三、儒学的权威化：汉唐经学 /252

四、儒学的哲理化：宋明理学 /266

五、儒学的再整理：清初朴学 /284

六、经学的复兴：近代新经学 /291

七、理学的复兴：现代新儒学 /296

八、结语：儒学的当代价值 /298

后记 /301

第一章 现代新儒学思潮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现代新儒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课题。以方克立、李锦全教授为负责人成立的“现代新儒家研究”课题组,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有数十位中青年学者参与研究工作。已发表的文章数以千计,出版的专著也有几十部之多。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马一浮、方东美、张君勱、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余英时等代表性人物,都有人做专门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本书在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概念。“现代新儒学思潮”当然包括“现代新儒家”,但研究范围不仅仅限于“现代新儒家”,其外延比“现代新儒家”大得多。无论站在怎样的学术立场,无论持着怎样的学术观点,只要是从现时代的视角研究儒家思想、诠释儒家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的学问,都可以看成“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组成部分。何谓“现代新儒学思潮”?笔者的看法是:它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之一,以融会中西学术思想为基本特征,以发展人类精神文明为根本宗旨。它一方面面向世界,吸纳、理解、转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学术思想;一方面基于时代的要求,反省、充实、推进传统的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在现时代获得新的表达方式,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的精神家园。现代新儒学思潮发端于现代新儒家,但不限于现代新儒家。它作为中国现当代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其范围已超出少数的现代新儒家。许多学者并没有沿用现代新儒家的思维定式,而是以各自的方式研究、诠释儒学,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属于现代新儒学思潮的范围。“现代新儒学思潮”是指社会思想动向,“现代新儒家”是指特定的学

派，尽管二者的外延有部分重合的情况，但毕竟不是同一概念。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遇到种种困难，但毕竟延续到了今天，并且仍然保持着向多重向度进一步发展的态势。“现代新儒家”已经成为历史，而“现代新儒学思潮”正在参与创造历史。

一、现代新儒学思潮的起因

现代新儒学思潮之所以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同当时已经形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有密切的关系。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抱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心态，有意无意地把西学理想化，看成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常常把中学与西学对立起来，把中学等同于旧学，把西学等同于新学，对儒家思想缺少应有的同情。平心而论，他们尚未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到五四时期这种情况有了变化。在这一时期，新式知识分子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改观。从人数上看，一大批留学日本的学人回国，从中国自己办的新式学校中也走出了数量可观的毕业生。从质量上看，有一批在欧美取得高学历的学人回到祖国。由于对西方文化了解得比较深了，中国人发现西方文化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诸多弊端。特别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对这种弊端看得更为清楚，逐步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重新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新学与旧学的关系，重新审视固有文化的价值。于是，从新式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涌现出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都出自这一群体。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当然也就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开山。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已由传统社会形态的“破坏”转向现代社会形态的“建设”。在辛亥革命以前，先进中国人关注的焦点是传统社会形态的“破坏”，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斗争。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成立，废除了统治中国数千年之

久的封建帝制，“破坏”的目的应该说基本达到了，可是中国的社会状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趋于恶化。打倒了一个清廷小皇帝，冒出了数十个土皇帝，军阀争战接连不断。“无量黄金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正如孙中山所说：“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不聊生矣。”^①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仅有“破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着眼于“建设”；“建设”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这里所说的“建设”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包括经济建设、制度建设，也包括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可以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而西方的社会状况和精神文明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中国人必须进行独立的探索。孙中山提出“心理建设”理论，是在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作的探索；陈独秀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说法，是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现代新儒家提出的各种学说，也属于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探索。

现代新儒学思潮是对五四时期批孔思潮的反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把挽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西学的引进上，并且把传统儒学视为引入西学的思想障碍，形成扬西抑中的倾向。这种倾向到五四时期演化为“打孔家店”的批孔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批判传统儒学所包含的封建主义思想因素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他们把儒学完全归结为封建主义，全盘否定其正面价值，流露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情绪。有些人甚至提出一些过火的、不切实际的主张，如废除汉字、把线装书丢到茅厕中去，等等，这显然有损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提升。正是针对激进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现代新儒学思潮开始兴起。从新式知识分子队伍中走出来的现代新儒家学者，认同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反对封建主义，接纳现代性，有别于守旧派；他们拒斥全盘西化论，摆脱激进情绪的困扰，以理性的眼光和同情的态度看待儒学的价值，努力推动儒

^① 《孙中山选集》，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学的现代转化，有别于激进派。在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方面，他们是有贡献的。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现，同世界性文化批判思潮也有密切的关系。自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世界哲学走入中国。我们考察现代新儒学思潮，既要看到它兴起的国内背景，也要看到它的国际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更加表面化、尖锐化，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弱点，于是形成世界性的文化批判思潮。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用“没落”一词形容当时西方人的思想状态。梁启超考察欧洲之后，在《欧游心影录》中作了这样的报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盘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样是好。”现代文明的一大问题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在现代西方思想界，批评科学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强，呈现出人本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大都把西方看成可以学习的“老师”，听到的是赞扬西方现代文明的声音，而听不到批判的声音。梁启超把批判的声音传递到中国，自然会引起极大的震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重新审视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西方思想界中出现的价值迷失感，为以价值理性为中心的儒学获得了发展的契机。现代新儒家从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中寻找现代转化的资源，试图创立儒学的新形态。

上述原因是现代新儒学思潮兴起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现代新儒学思潮出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儒学确实有实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能够成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既有时代性的一面，也有民族性的一面。因其有时代性，传统儒学作为农业社会的产物，不能不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甚至被帝王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发起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其实并不是对儒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把矛头指向传统儒学的历史局限性。李大钊说：

“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① 在这里，他把“孔子之本身”同“孔子之偶像”区分开来，明确表示只掊击后者，而不是前者。五四时期对传统儒学历史局限性的批判有积极的意义，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这是不能否定的，那种视此为“文化断层”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传统儒学既有批判，也有同情的诠释。^② 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左”的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夸大了五四时期“批孔”的一面，而忽视了“释孔”的一面。五四时期对传统儒学的历史局限性的批判，贡献在于凸显出儒学实行现代转换的必要性。正如贺麟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形式末节和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他们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它们的洗刷扫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③

由于儒学有时代性的一面，必须清除历史灰尘，适应新时代要求不断作出新的诠释，从而促使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形成。由于儒学有民族性的一面，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如何发掘儒学体现时代精神的正面价值，将是一个恒久的课题。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现也是必然的。从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看，任何社会组织必须有一套全体社会成员达成基本共识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这是每个民族形成所必不可少的文化共识。这种文化共识可以采用宗教的形式来表达，也可以采用非宗教的形式来表达。大多数民族采用宗教的形式，如伏尔泰说，一个民族即便没有神，也要造出一个神来。中华民族则采用非宗教的形式，这就是儒学。儒学是世界上少有的以非宗教的、内在超越的方式安顿精神世界的成功

① 《李大钊选集》，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② 参见宋志明：《批孔与释孔：儒学的现代走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③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9页，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

模式（有别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有效地组织社会、安顿人生，已形成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并且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儒学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不会因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终结。如何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克服传统儒学的局限性，走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误区，摆脱“左”的偏见，重估儒学的价值，开发儒学资源，培育适应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精神，将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理论任务。

在启蒙主义的话语下，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过分强调现代对于传统的变革，而忽视现代对于传统的继承。这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尽管各国都曾发生过批判基督教的启蒙主义运动，但基督教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实行现代转化，依然发挥着文化共识的作用，依然维系着现代西方社会的运转。在五四时期，中国受启蒙主义的影响，也出现了全盘否定儒学的西化思潮。西方基督教受启蒙主义思潮的冲击，并没有消失，而是实行了现代的转化；同样，儒学受到西化思潮的冲击也不会消失，也会实行现代转化。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现，正是对西化思潮的反弹，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潮的主导下，儒学被视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予以全盘的否定：儒学的历史局限性被夸大了，儒学的普适性被消解了。在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儒学只是被驱逐的消极因素，“打倒孔家店”成为流行语。许多人把“打倒孔家店”说成五四时期的口号，实际上是个误传。在五四时期，并没有“打倒孔家店”的提法，近似的说法是“打孔家店”。胡适曾在为吴虞的书作序时，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并没有用“打倒”二字。“打倒孔家店”以至于“批林批孔”的口号，都是“左”的话语，反映出全盘否定儒学的偏见。

儒学是极其复杂的民族文化现象，不能把儒学简单地等同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儒学与中华民族已构成共生关系，为中华民族形

成社会组织、安顿价值提供哲学基础。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

第一，有作为学理的儒学。儒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原理，体现人类性或合群体性，具有普适价值。在先秦时期，孔子通过反思“礼崩乐坏”的历史现象，建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建立道德规范，并不是官方哲学。后儒讲论儒学，并不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说话的，有许多人都是当作学理来研究的。虽然历代儒学家关于儒学的阐述，对于我们认识儒学社会组织原理有帮助，但仍需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作出新的阐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是一门常讲常新的学问，可以实现现代转化。

第二，有工具化的儒学。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学从一家之言上升为官方哲学。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主导地位以后，也并不是一种声音，而是多种声音。在儒学营垒中，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分疏，有宋学与汉学的分疏，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分疏。儒学内部不同学派的讨论，有助于儒学在成为官方哲学之后，仍保持着发展学理的活力。毋庸讳言，儒学在古代中国社会曾经被统治者当成思想统治的工具，有禁锢思想的负面效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贵族化、制度化、政治化的儒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在批判工具化的儒学的时候，抹煞儒学的普适价值。

第三，有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先秦以后，的确有些儒者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讲论儒学，推动工具化的儒学，但并不是所有的儒者都是这样做的。有相当一部分儒者并不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讲论工具化的儒学，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讲论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陈献章、王艮及其从学弟子，大都是抱着这种态度。在王艮的弟子中有许多人就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讲论儒学，不抱有任何功利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儒学在中国已经有几千

年的历史，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成为中国人树立道德理念、处理人际关系、凝聚民族群体的理论依据。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有别于贵族化、制度化、政治化的儒学，可以称之为民间儒学或草根儒学。这样的儒学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而有实行现代转化的充分根据。

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君主政体看成唯一的栖息地，认为随着君主政体的解体，儒学也就成为历史陈迹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儒学的栖息地并不是一个，至少是三个：君主政体、家庭、心灵深处。作为统治工具的儒学是同君主政体伴生的，随着君主政体的废除，显然已经寿终正寝了；可是，作为学理的儒学和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并不是君主政体的伴生物，绝不会因君主政体解体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君主政体废除了，可是家庭并没有因之而废除，人们心灵深处的集体记忆并没有因之而消除。这两个儒学栖息地仍旧存在。由于失去了君主政体的维护，人们的儒学观念可能会有所淡化，不再成为主流话语，但绝不会消失。当批儒的思想风潮高涨的时候，儒学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风潮过后，人们冷静下来，同情儒学的思潮很快就会抬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笔者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亲身体验到，即便在“批林批孔”的声音压倒一切的时候，人们对儒学的同情感也没有完全消失。记得当年梁漱溟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勇敢地站出来为孔子辩护，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暗地里表示由衷地佩服。“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在20世纪80年代初，同情儒学的思潮之所以很快就流行起来，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君主政体被推翻以后，儒学的主要栖息地，失掉了一个，但还剩下两个。由此观之，儒学在中国仍有进一步存在和发展的可能。那种把儒学视为“游魂”的说法，笔者不敢苟同。

今日的中国是昨日的中国的继续，任何不尊重历史的虚无主义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以后，没有抛弃有

广泛社会基础的基督教，而是促使其实行现代转化；同样，中国建设现代化，也不可能抛弃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儒学，也应当促使其实行现代转化。这正是现代新儒学思潮发生的内在原因和根本原因。

二、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历程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五四时期的草创阶段，20世纪30~40年代的理论建构阶段，50年代以后内地的“批孔”和港台地区新儒家活跃阶段，从70年代开始的学风转折阶段。

（一）五四时期的草创

考察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应当从考察五四后期涌现出来的现代新儒家着手。虽然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但毕竟是这一思想运动的发起者。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甚至可以同先秦时期媲美。如果用“百家争鸣”来形容先秦时期的思想活跃程度的话，也可以用“小百家争鸣”来形容五四时期的思想活跃程度。从五四时期开始，西方学术思潮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各种各样的学说几乎都有人介绍，杜威、罗素等著名的哲学家也纷纷到中国讲学，中国到欧美的留学生选择同中国文化有关的题目作博士论文的题目（如胡适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从此，西方学术走入中国，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当然，这种交流并不是平等的，西方学术处于强势，中国学术处于弱势。西化思潮在五四时期占主流地位。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并且企图恢复君主制，预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发全国性的反袁斗争，他的皇帝梦也没有做成。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几个派系，并且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北洋军阀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还打起了“尊孔”的旗号。1919年10月，

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出面举行秋丁祀孔活动，北京政府还规定孔子生日为公休假日。徐世昌还组织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自我标榜。当时还有人提议把尊孔写入宪法。当局的尊孔活动受到先进中国人的激烈批判。李大钊说：“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之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缘故。现在经济上发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它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护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① 陈独秀写了《驳康有为致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再论孔教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文章，认为孔子之道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应当抛弃，反对北京政府搞尊孔活动。反对尊孔的思潮与扬西抑中的西化思潮会合在一起，形成在思想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批孔潮流。

五四时期的批孔潮流的积极的意义，在于推翻旧式儒学在思想界的权威，清算封建主义，粉碎统治者把儒学工具化的图谋，起到了倡导启蒙、解放思想的作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觉醒达到了新的水平。由于推倒了旧式儒学的权威，为新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揭开了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新的一页，进入现代阶段。但是，这一潮流也有明显的缺陷。第一，由于当时形势所迫，批判者有意无意地把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混在一起，感情色彩很浓，甚至把对军阀政府的憎恨迁怒于儒学，难以保持学术批判的清醒和冷静，往往使用一些过激的语句，理论深度不够。第二，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批判者只看到儒学的局限性，而没有看到儒学的合理性，仿佛把洗

^① 《李大钊选集》，301~302页。

澡水和小孩一起都丢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这个运动的发展。”^① 批孔潮流存在的这些缺陷，成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诱因。

面对批孔潮流，第一个站出来“为儒家说话”的是梁漱溟。1917年，梁漱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到北大哲学系任特约讲师，他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② 由于受到批孔潮流的触动，原本信仰佛教的梁漱溟转向儒家。他在北大任教期间，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自印成册，散发给友人。这时，他已放弃佛教的出世主义，皈依儒家的人世主义，表示以关注国事民瘼为己任。

那时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旧两派争论得很激烈。梁漱溟拒斥批孔潮流，对儒家表示同情与敬意，似乎倾向于旧派，但他并不是旧派中人。他与李大钊等新派人物有交往，也有共识。他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新旧两派争论的问题，致力于儒学的新发展。在他看来，以辜鸿铭为代表的旧派只是株守传统儒学，实在不是陈独秀等新派人物的对手。“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他们自己思想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能禁得起陈先生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③ 旧派之所以败下阵来，吃亏吃在“思想内容异常空乏”上，可见一味守旧是行不通的，并不能真正弘扬儒学。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努力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7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③ 同上书，205页。